

近世日本与天主教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程文

16世纪中叶,在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之下,耶稣会传教士渡日传教,将天主教及西方文化一并传入日本,打破了日本传统的亚洲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模式,拉开了日欧之间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与交流的序幕。

日本当时正处于由混乱逐步走向统一的战国时代末期。尽管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但经过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历经佛、儒两教的文化洗礼,已经积淀了深厚的具有自身独特性格的东方文化底蕴。而天主教作为完全异质于东方文化的外来文化,在日本社会世俗权利的影响下,走过了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艰难传教历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随其传入的先进西方文化却深深的扎根于日本,渗透在社会诸领域之中,推动了近世日本社会科学的繁荣,也为日本近代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启蒙做了前期的文化敷垫。

本文通过对天主教的传教历程、遭受不同际遇之原因及对日影响等问题的阐述,揭示了近世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史上的特殊时期的独特民族文化心理。

一、天主教在日本步履维艰的传教历程

自16世纪中叶起,日本已开始步入吸收外来文化的特殊时期——东西方文化共同吸收期。1543年,洋枪的传入为日本与欧洲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关于洋枪的传入概有日本史书记载的1543年说和欧洲方面记载的1542年说^①两种,本论文采用前一种。在继洋枪传入后的1549年,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漂洋过海渡日传教,谱写了日欧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最初来日本传播天主教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 Fran Ciscode Xavier 1506—1552年)。(耶稣会是十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在东亚地区的主要传教组织,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军官伊格纳修·罗耀拉等人创建于巴黎,以向全世界传播天主教扩大教皇影响和教会势力范围为己任。)1549年沙勿略与西班牙神父托尔雷斯、传教士费尔南德斯以及因畏罪潜逃而皈依耶稣会的日本人弥次郎一行4人来到日本,8月15日到达日本南部的鹿儿岛,开始了初期的传教活动。在岛津贵久的保护下沙勿略等人顺利传教于萨摩地区,约有百余名日本人开始信教。其后为扩大传教规模和范围,在1550年8月至1551年末,沙勿略等人先后去了平户、博多、京都、丰后、山口等地传教。此间,沙勿略于1551年初到达京都,希望得到天皇的特许获得在日本全国的自由布教权。但是战国时代残酷的社会现实打碎了沙勿略的美好愿望,京都一行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其只好离开京都,回到山口继续开

展传教活动。1551年11月,沙勿略带领弥次郎等返回果阿,托尔雷斯和费尔南德斯则留在日本继续传教。1552年,沙勿略病死在去中国传教的途中。沙勿略等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由南到北纵跨半个日本进行传教活动,受洗信徒达近千人,为日后天主教在日本的迅速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沙勿略之后,又相继有耶稣会传教士来日传教,1560年有8人,1570年有11人^②,天主教在日的传教力量得以日益增大。托尔雷斯等人沿袭了沙勿略的和平传教方针和“商教一体化”^③的策略,采取整体上由下至上、由地方向中央发展,局部上则是由上至下,利用领主、大名影响其家臣、领民的传教政策。首先用西方的奇玩珍品和海外贸易对各地方大名、领主相诱,在其保护下自由传教,并以此为基石,伺机向中央方向发展。

在1551年到1569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耶稣会传教士的足迹遍及九州和本州部分地区,在各地方大名、领主主的积极支持保护之下,传教活动迅速展开,教会的影响不断增大。1552年9月,传教士在山口地区创建了第一座教堂,标志着传教活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后府内、博多、平户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教堂和各种辅助设施,受洗信徒日渐增多,传教活动逐步向周遍地区延伸并已深入到九州地区。1561年,传教士在大村纯忠的领内取得布教权。1563年,大村纯忠带领家臣集体受洗,成为日本的第一个“切支丹大名”。此后的5、6年间,传教活动迅速展开,成效显著。在日本的九州和本洲部分地区的沿海港口等地建造的教堂和医院等传教辅助设施多达十几所,受洗信徒约两万名左右^④,天主教信仰已深入到该地区日本民众的心中。

1568年,日本的统一政局已见明朗,织田信长已成为日本强有力的统治者。1569年初,耶稣会传教士弗洛伊斯等人拜见了织田信长,得到了在信长辖内自由传教的特许。传教士在信长的保护和利用的宽容政策之下,终于迎来了在日传教活动的繁盛期。其以京教为中心重点地区,开展传教活动。到1571年,日本全国各地的信徒总计约25000人左右^⑤教堂多达40余所。随着教势的飞速发展,京教等地出现了大批的寺院僧侣改宗信教和地方大名皈依天主教的现象,致使信徒的人数激增。1576~1578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京都建造了一座三层结构塔形建筑的新式教堂,史称“南蛮寺”。1580年,又在近江安土城下町建造了安土“南蛮寺”,标志着耶稣会传教士在日传教活动处于鼎盛时期。到1581年,全日本有祭司和修道士75人,教堂200所,信徒15万人^⑥。

然盛极必衰,天主教繁盛时期的到来也预示着其悲剧命运的开始。1582年,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⑦,1584年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除陆奥外)。秀吉在统治之初的1584~1587年间未采取任何妨碍和危害传教活动的措施,使天主教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此景如昙花一现,甚为短暂。1587年7月24日,秀吉突然发布“伴天连追放令”,宣布在法令发布后20日内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开始对境内的传教士实行驱逐政策,并对传教活动加以限制。后因海运问题传教士20天内无法离开日本,秀吉便命其全部集聚到平户地区以待离日。传教士为避免与秀吉正面冲突,便由公开转入地下,进行隐匿传教活动。秀吉对此也未深加追究,视若无睹。至此,天主教在日传教活动完全被秀吉所控制。但1596年的“圣·费利浦号事件”打破了这一赖以继的局面,更加坚定了秀吉打击天主教的决心。1597年2月,秀吉

将在该事件中被逮捕的传教士和信徒共 26 人在长崎处以磔刑，史称“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⑧。该事件是日本禁教史上的第一次大屠杀，标志着秀吉对传教士开始实行残酷的镇压迫害政策，传教活动处于低潮期。1598 年 8 月，秀吉因二次侵朝战争失败，忧忿成疾，卧病而死。德川家康经关原之战登上统治地位，日本进入江户幕府时期。

德川家康统治之初，为垄断海外贸易、巩固政权，暂缓了对天主教的迫害。耶稣会传教士抓住此一有利时机使天主教得以复苏并迅速壮大，到 1605 年日本天主教信徒已达 75 万人，日本的长崎已成为“远东的罗马”^⑨。但 1609 年切支丹武士冈本大八和切支丹大名有马晴信的渎职事件，再一次改变了天主教的命运。家康先后在 1612 年、1614 年发布两次禁教令，由京都开始实行从局部到全国的大禁教。下令驱除传教士、关闭教会、毁坏教堂、禁止举行各种天主教仪式和集会。并强令信徒改宗，如拒绝则严惩。在德川幕府的残酷镇压迫害之下，传教活动进入了悲惨的衰败期。为了禁教德川幕府特意发明许多残酷刑罚，如裸体游街、面部烙印、竹锯锯头、切指、磔杀、落谷、火熏、倒吊于粪坑中、踏绘等。1619 年 10 月，德川秀忠在京都地区，一次用火刑处死 53 名教徒^⑩。1622 年 9 月在长崎西坂用火刑和磔刑处死传教士、教徒共 55 人^⑪。德川家光继位后，为禁教自 1629 年先后发布五道锁国令，除与中国、朝鲜、荷兰三国保持有限的贸易往来之外，与其他外部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在德川幕府的残酷镇压、迫害的禁教政策之下，1640 年葡萄牙人被迫退出日本，天主教在日传教活动至此宣告结束。

二、天主教在日本前后遭受截然相反的际遇的原因

1549 年沙勿略来日传教至 1640 年葡萄牙人退出日本，耶稣会传教士在日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传教生涯。天主教经历了传教前期的繁盛与喜悦和后期遭禁的苍凉与悲怆，走过了跌宕起伏的艰苦历程。其之所以遭受前后截然相反的际遇，究其因是纷繁复杂的，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日本受众之间的主客观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1. 天主教传教初期迅速繁盛的原因

①日本战国时代的残酷现实，为天主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16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正处于由混乱逐步走向统一的战国时代末期。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战乱频繁，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佛教僧侣也在欲望和贪念驱使下，堕落成对世俗权利和物资利益的贪婪追求者，唯一可以慰藉心灵的佛教也因此丧失了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日本人民处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之中，渴望寻求一种全新的社会理念和宗教信仰，来支撑和安慰已陷于苦闷、彷徨、空虚的精神世界。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当一个社会出现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或心理危机时，人们就会对原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社会理念。”^⑫恰在此时天主教来到日本，作为全新的宗教信仰，其“博爱”、“平等”、“自由”的宗教思想对日本民众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与诱惑力，成为民众现实生活中的新的精神寄托。

②耶稣会传教士因地制宜，采用独特的传教方针与策略。其一：针对日本社会文化背景采用适应主义的和平传教方针。战国末期的日本虽社会极为动荡，但其已历经千年的文化积

淀,已具有深厚的自身独特性格的东方文化基底,是一个有相当文化高度的国家。传教士为避免和日本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采取适应主义的和平传教方针,即在原则上不违背天主教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应尽量迎合适应日本的风俗习惯、文化环境,使传教方式日本化。为此传教士尊重日本传统文化习俗,尽可能减少和排除被怀疑和误解的可能。通过学习日语,把教义翻译成日文,用日本固有的文化形式表述教义,甚至把教义中一些术语翻译成佛教用语。此外,为表示对传统日本文化的尊重,还模仿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服装、起居、装饰等方面采取日式习惯,使其自身生活日本化。其二:针对日本统治者的利益需求,采取宗教与贸易相联合的商教一体化的传教策略。当时的日本,与中国传统勘合贸易几近终止,国内经济萧条。各地方大名、领主为增强实力制霸天下,急需大量军事物资、财富的积累与补给,渴望与海外进行贸易往来。传教士洞悉日本统治者的此种心理,将信教和商船贸易结合起来,采取商教合一的互利政策。在巨额贸易利益的诱惑、驱使之下,各地大名、领主对传教士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传教士大开方便之门。或在自己领内划出土地献给传教士,或带头受洗成为虔诚的“切支丹大名”,以达到一己之目的。如肥前领主大村纯忠为开辟港口吸引商船贸易就亲自接受洗礼,成为日本第一个“切支丹大名”。其三:针对日本民众的实际需求,传教士积极倡导推行各种社会事务、致力于慈善事业,通过传入的西方世俗文化和创建教堂、医院、孤儿院、教会学校等慈善机构,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吸引更多的日本人信教。

③日本统治阶级自身的政治需求。日本的统治阶级除为获取贸易利益之外,另一目的就是巩固其统治地位、强化军事实力、实现统一天下的政治角度出发,利用天主教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致使天主教得以顺利的传播。如织田信长为达到统一日本的政治目的,把天主教作为消灭其敌对势力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当时以南都北岭为中心的大寺院、大神社势力;实力雄厚的大名、领主;以及一向宗农民暴动,是影响信长推行统一大业的三种敌对势力。信长为消除敌对势力,采取抑佛兴教的方针,对天主教采取保护和利用政策,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甚有成效。1578年,信长就利用传教士奥尔甘迪诺采取胁迫手段,逼迫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投降,为其统一大业扫平障碍。传教士也正是在这种互惠互利的条件下得以迅速发展繁盛的。

2. 天主教传教后期遭禁的错综复杂的原因。

①天主教的文化理念与日本封建集权统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天主教宣扬博爱、平等、自由的宗教伦理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世间的一切,是最高权威,强调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世人不论身份高低贵贱都是上帝之臣民,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这种人人平等的西方伦理思想,与以将军为最高权威,严格推崇忠君思想、主从关系、家族制度等级禁严的日本封建伦理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与日本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维系其统治的幕藩体制是根本对立的。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神、佛、儒教的排他性,也是自古以“神国”自尊和被尊奉为“东照大神化身”的德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是对积淀已久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挑战,势必会引起日本统治者强烈反感和抵制。此外,天主教还倡导婚姻的单一性和不可解除性,主张男女平等,反对日本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和蓄妾行为,反对堕胎、切腹、贩卖人口等。天主教的这些伦理思想都是直接地、正面地与日本封建集权统治、伦理道德思想相对立、相冲

突,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②传教活动的扩展加剧了幕府统治的危机。其一,天主传教规模的扩展,信徒的激增,引起幕府的恐慌。1581年,日本全国信徒约有15万人,在此后的10余年间,飞速发展到30余万人。到17世纪初,日本全国的天主教徒已激增至75万人之多,天主教已深入民间,遍布日本各地。传教士通过把信徒组织起来,编成讲、组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教活动。此种传教行为使德川幕府深感不安,深恐这些天主教徒被丰臣秀吉的遗族、旧臣以及反德川势力所利用,组织农民起义或暴乱。并且德川幕府也惧怕天主教信徒那种为捍卫宗教信仰,不畏强权、不怕死的精神。为此德川幕府为稳固政权统治,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抑制和打击天主教。其二,天主教逐渐渗透到德川幕府统治的内部,形成幕府统治的潜在威胁。天主教不断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许多地方大名、领主、中央官吏以及德川氏的近臣都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1609年发生的“切支丹武士”冈本大八与“切支丹大名”有马晴信的渎职事件,已引起了德川幕府的高度警觉和震惊。且许多切支丹大名、武士对天主教的虔诚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将军的孝忠,为表明对天主教的忠诚不惜牺牲一切。此外,位于日本西部地区的大名、领主,原本是丰臣秀吉的遗族或旧臣,同时又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始终对德川幕府心怀不满。而天主教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就似一张无形的网,将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形成一种潜在力量。这些潜在力量一旦爆发或被天主教所利用,则足以动摇德川政权的统治。

③幕府为防止西力东侵、维护国家安全。天主教作为外来的西方宗教,其主旨是在日本为罗马教皇开辟新的传教基地,虽采取适应主义的和平传教方针,但因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仍摆脱不掉殖民主义侵略的色彩,使日本统治者一直对其心存疑虑和恐惧。如1596年的“圣·菲力蒲号事件”已把天主教的侵略本质暴露无疑。在丰臣秀吉的部将增田长盛与该船船长谈及西班牙的广阔领土是如何得到时,船长答说:“先派传教士,使其国民成为信徒,然后派遣军队与信徒里应外合,征服该国。”^⑩丰臣秀吉闻此后,随即开始对传教士和信徒进行大肆屠杀与迫害。17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国家英国、荷兰为开拓海外贸易与原料市场,相继来到日本与西、葡两国展开贸易竞争。为打败竞争对手,英、荷两国在德川幕府面前不断揭露西、葡两国殖民侵略的本质,中伤西、葡两国在利用天主教征服日本。幕府为维护自身安全和民族尊严,防止西方殖民势力利用天主教东侵,即采取极为残酷野蛮的禁教政策打击消灭天主教。

三、天主教文化对近世日本的影响

天主教虽然被禁,但是作为传教附属品伴随天主教传入的西方文化却深深扎根于日本。与十五、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文化相比较,其具有传统的保守性和相对的滞后性,属于欧洲南部封建末期文化。尽管如此,对处于封建统治时期的日本来讲,仍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思想性。随着传教活动的展开,其已渗入日本社会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生活习俗等领域之中,对近世日本社会的进步、科技的繁荣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教育文化领域,传教士为扩大传教所需,涉足教育文化事业,有选择的向日本移植西式教育。传教士通过在日开办神学校、神学院、培训院等各种教会学校,积极开展教育活动。

1561年，在府内建立第一所教会学校。翌年，横濑浦、岛原、口津等地也相继创建了教会学校。1581年，有马神学校、府内神学院、安土神学校也先后成立。传教士在学校开设修辞学、哲学、伦理学、神学、数学、法学、历史、语言学（拉丁语和葡萄牙语）、绘画、音乐等课程，主要以神学和哲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西式教育，培养专门神职人员。但传教士在授课的过程中，许多方面都超出了纯粹的宗教教育范围，把西方先进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知识一同传授给日本学员，为西方文化在日本生根发芽播下了极具生命力的种子。如作为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传教士将西方的绘画和音乐艺术传入日本，把西方的油画、炭笔画、铜版画、声乐、器乐等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系统的传授给日本学员，培养了一批深谙西方艺术精髓的年轻学员。此外，在语言学方面，传教士为消除语言障碍，在传教同时长年致力于语言学的学习、研究和翻译工作。对葡萄牙语、拉丁语、日语三种语言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编撰出版了一系列容量大、知识性、系统性强的辞典与书籍，为日本的语言学的教育、研究作出了贡献。

在科学技术领域，首先，传教士的到来打破了日本传统的地理观念，即世界仅限于中国、日本、印度的三国世界观。传教士把当时西方运用科学椭圆形法与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海图及地球仪等传入日本，开阔了日本人的视野，丰富了日本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日本统治者也对世界地理表现出极大兴趣，多次通过传教士了解世界各国地理概况、风土人情。1590—1591年葡萄牙人蒙泰罗使用观象仪测定西日本的纬度，修订了行基图问世以来的日本地图，确定了日本在世界地图上的准确位置。使日本人有了正确而完整的世界地理认识，推动和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发展。其次，传教士传教过程中极力推崇西欧天文学，并将天文学作为教会学校的必修科目，向日本人讲授宇宙的构造、天体运行说等。打破了儒家的天方地圆说和佛教须弥山世界说的东方传统天文宇宙观，带给日本全新的天文学。尽管其没能脱离欧洲中世纪的地球天动说的束缚，但它解释了许多东方传统宇宙观所不能解释清楚的各种自然现象，显示了其相对的优越性，改变了日本人传统宇宙观。再次，传教士为扩大影响顺利传教，将西洋外科医术最早传入日本。1557年，神父阿尔梅达在府内开设了由内科、外科、小儿科和麻疯病科组成的日本第一所综合医院。因其医疗成果显著，声名远播京畿、关东地区，求医者日增。后因医生不够，阿尔梅达便开始临床教授外科医术，为日本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材。使西方外科医学得以在日本医学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开辟了日本西方医学的研究道路，为日本近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四，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商船贸易的展开，刺激了日本航海术和造船术的发展。日本人通过在实践中向西方航海家求教，逐渐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术。1618年，池田好运根据亲身航行的经验编撰了《元和航海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如何运用新太阳历和西洋风的时间进行观测的方法，以及从长崎到吕宋、澳门、朝鲜的航线，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此外，日本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目的，对船只的购入和制造表现出极大热情。织田信长于1578年就命部下在葡萄牙人指导下建造铁甲船。丰臣秀吉为侵略朝鲜也曾先后两次向传教士提出购买大型运兵船只。德川家康也曾令三浦按针制造80吨和120吨等大型西式帆船。1613年，伊达政宗制造的斯库那型帆船成功的横渡太平洋，标志着日本的航海术与造船术在当时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第五，西欧活字印刷术的传入是耶稣会传教士的又一突出贡献。1590年，传教士瓦利尼亚诺将西式印刷机及印刷技术传入日

本。1591年，日本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运用活字印刷术的书籍《信徒作业内容书》。此后大量的宗教教义教理书，语言学书，翻译等采用活字印刷术的书籍出版，使日本传统印刷业为之一新，极大的推动了日本印刷术的发展。

在生活习俗领域，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开展，西方世俗文化也日益渗透到日本社会内部，时刻影响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西方服饰样式新颖、惹人喜爱，日本人多迷恋和竞仿穿着。西方的油画、铜版画、宗教雕像、刀剑、乐器等被视为工艺品收藏。作为天主教标志的十字架、念珠等也被日本人作为装饰品佩带身上。就连位居于日本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也将居室装饰布置成洋风西式，陈列各种西式用具，做为一种社会时尚和身份地位的象征。1586年，丰臣秀吉在接见传教士柯厄略一行时，曾特意将一间装满生丝、金银、西式卧床和黄金造的茶室的房间打开，让其参观。此外，许多日本信徒同时兼具本名与教名两种名字。作为西方传统节日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在日本也非常盛行，且一直流传至今。

四、结束语

近百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在日本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实为罕见，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在此次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冲突和碰撞中，作为异质的外来文化，天主教始终未能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地位。日本统治阶级时刻都在依据国家需要、阶级利益、文化传统对天主教做着相应的选择和取舍。虽然初期天主教曾一度荣光，但日本世俗权利的更迭规制着天主教的命运，最终其难逃失败的悲惨命运。但此种失败也仅是宗教意义上的，作为外来文化中的物质层面和心物结合层面中的极具穿透力的科学技术却被日本社会所吸收，并逐渐渗透社会各领域之中。此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在首次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表现出的既试图通过吸收先进外来文化追赶世界进步潮流的强烈冲动，同时又惧怕外来文化危害其自身安全、利益所充满恐惧与不安的矛盾的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正因此，才得以使西方世俗文化在日本生根发芽，不断推动近世日本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为其后兰学及洋学的繁荣培养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也为日本近代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启蒙做了前期的文化敷垫。

注释：

- ①杉本勋：《日本科学史》，郑彭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1、122页。
- ②④⑤⑥李小白：《信仰·利益·权利——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39、43、45页。
- ③⑧⑨⑩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230页。
- ⑦本能寺之变：1582年3月织田信长开始西征，6月其家臣明智光秀发动叛变，包围了信长的住地本能寺，最后信长自焚而死，史称本能寺之变。
- ⑪⑫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1页。
- ⑬赵德宇：《西力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责任编辑 崔新京）

近世日本与天主教

作者: [程文](#)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刊名: [日本研究](#) CSSCI
英文刊名: [JAPAN STUDIES](#)
年, 卷(期): 2003, "" (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条)

1. [杉本勋](#), [郑彭年](#) [日本科学史](#) 1999
2. [李小白](#) [信仰·利益·权利——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 1999
3. [武安隆](#) [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 1993
4. [王金林](#) [简明日本古代史](#) 1984
5. [赵德宇](#) [西力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 200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rbyj20030401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17eff82c-9506-4c76-b583-9e4d0081f3ba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